

重探臺北市內「古亭」和「大安」地名源流：

一個跨學科考證的嘗試ⁱ

簡宏逸ⁱⁱ

摘要

地名反映一個地方的人類活動，在文獻不足時，可以幫助我們重建地方史，但需要慎防望文生義的解讀，並且透過語言學、地理學、歷史學交互運用考證，以正確重建地名源流和地方歷史。本文以臺北市「古亭」和「大安」兩地名為例，首先發現對「古亭」和「大安」地名源流的解釋，都無法同時滿足語言學、地理學、歷史學的檢證，有賴重新檢討。本研究運用近年出版和數位化的古契字史料，以及反映早期閩南語的材料，考察這兩地名發生的歷史和地理環境，並進行語音和語意的分析。最後發現「古亭」可能來自於一個未被字書辭典記載的名詞「罟亭」，和新店溪的漁業活動有關。但語音的線索也指出「古亭」可能來自「孤壇」，是祭拜無主孤魂的地方。「大安」的前身「大灣」在瑠公圳通水前就已出現在文獻上，可見傳統上認為「大灣」來自瑠公圳轉彎的說法有誤。本文認為「大灣」的意思是大水池，其所指是目前已經消失的一座大陂。由於語言和文字的演變，大灣的「灣」失去他在十八世紀出現時的意義，導致後來各種分歧的解釋。除了解釋地名源流，本文對兩地史料的分析，也讓此處的早期歷史圖像漸漸明朗，補充了傳統臺北歷史書寫上的空白。

關鍵詞：方言韻書、地名考證、古亭、大安、古契字

ⁱ 本文初稿曾以〈地名考據與早期地方史：以「古亭」和「大安」為例〉為題，於2010年6月6日在「2010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發表會」宣讀。感謝評論人翁佳音教授的意見與鼓勵。經進一步收集資料和檢討後，結論已有相當程度的修改。

ⁱ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史學組碩士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Revisiting the Etymologies of Da'an and Guting in Taipei City: an Interdisciplinary Attempt

Chien, Hung-Yi

Abstract

Placename reflects human activities in a particular place. It also helps us to reconstruct local history of a less-documented place. However, this kind of reconstruction requires a synthetic approach that analyzes placename through linguistic,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methods, and then a sound reconstruction may be attained.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well-known placenames in Taipei City, *Da'an* and *Guting*, and finds the existing etymologies of them cannot pass the verifications of linguistics, geography, and even basic historical criticism.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new etymologies with evidences drawn from materials which reflect the Southern Min spoken in the genesis of the placenames in question. These linguistic proposals are then verified with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evidences. I propose two possible etymologies for *Guting*, *kóo-tîng* or *kóo-tân*. *Kóo-tîng* may be a forgotten form of *Koo-liâu* (storage of fishing net), and *Guting* does situated in a good fishing place. On the other hand, *Kóo-tân* means a simple alter for neglected graves or unidentifiable dead, and *Kóo-tân* became *Kóo-tîng* (*Guting*) at an unknown point of time. For *Da'an*, I first verify that *Da'an* is the altered form of *Tuā-uan*. *Tuā-uan* was traditionally interpreted as “big curve”, denoting a significant curve of the *Liugong Canal*, an irrigation system completed in 1760's. However, I falsify the traditional etymology by proving that *Tuā-uan* was attested two decades before the curve appeared. In fact, *uan* also meant “pond” in the Southern Min

spoke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evidences also suggest there had been a pond in today's Da'an District until 1910's. Thus I argue a new etymology for *Tuā-uan* that it was named after the big pond, and the meaning of pond had faded ou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king *Tuā-uan* difficult to be interpreted literally.

Keywords: Guting, Da'an, etymology of placename, land contracts, dialect rimebooks

一、前言

地名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基石。在早期文獻不足的情況下，地方史的重建往往需要透過地名來還原先民的生活景況。但隨著開發的腳步、人口的聚集、語言文字的演變，地名也經常有脫離原本文字或語音的現象，以致後人望文生義，在重建先民生活時產生偏誤，甚至難以為之。本文所探討的「大安」和「古亭」兩個地名就具有這樣的問題。這兩個位於臺北市核心地帶的地名，因臺北市近百年來的快速發展而具有高知名度，戰後至 1989 年之間，這兩者都是臺北市的行政區名，現在也都各自用來命名位於該地區中心的捷運站。但是這兩地在臺北盆地發展史的書寫中一直處於邊陲地位，不像艋舺、大稻埕、錫口等較早形成的漢人聚落，有較為詳細的歷史可供追溯。在沒有早期歷史可供參考時，地名成為研究者必須仰賴的線索。不過「大安」和「古亭」的起源又眾說紛紛(見第二節)，不同時期的研究又有許多未能徹底解決的問題，使這兩個地名的源流仍為臺北盆地發展史的謎題。

要解決地名源流的謎題，我們必須先釐清「地名」本身有什麼樣的性質，需要運用什麼方法來研究？地名本身是一種語言符號，人們用地名來指涉一個特定的空間。這樣的性質使地名研究兼有語言、歷史、地理三個面向。地名研究必須從這三種學科中借用方法，成為一種跨領域的綜合研究。陳國章就認為地名研究必須兼顧語言學方法、歷史學方法、地理學方法，其中又以語言學方法最為重要。因為地方的命名往往反映當地居民使用的語言，在多語並存的臺灣，不同族群的居民對其居住的地方皆可能使用不同的語言或方言，因此需藉由原始發音來探求其原始意義。他也強調「聽音辨義」，研究者不可對地名望文生義，必須從語音下手才能得到地名的原始意義¹。陳國章為地名研究提示了重要的方向：從語言的角度探討地名。不過他僅僅使用到語言學中的聲韻學和構詞學方法，而且在應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方法時沒有明確的方法論和操作方法。

日本地名學家服部英雄對地名的考證和解釋的方法論，則強調先回歸地名的發生。

¹ 陳國章，《臺灣地名學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2004)，頁 i-ii、56。

他主張有許多看似無法理解的地名，如果詳細考究、比較相同文化脈絡中類似的地名，並且對照已知的歷史事實，加上田野實查，我們就可以重新發現地名發生的脈絡，解釋地名的意義²。例如在日本關東地區常見的「三惣作」、「三草作」、「味増柵」、「味相作」、「見正作」等地名，通常都讀作 *misousaku* 或 *misosaku*。若從「味増柵」望文生義，恐怕會以為這是源於味増製造業的地名吧。這個問題，直到服部英雄考察群馬縣小泉町的「御正作遺跡」時才偶然解決。他原本以為「御正作」讀作 *mishousaku*，經當地人指點後才知道應讀作 *misosaku*，意思是日本中世時直屬於領主或地頭的田地，通常也是當地收穫最穩定的土地。從這個線索出發，他推論現在寫作「三惣作」、「三草作」、「味増柵」等地名其實都源自「御正作」，只是經過數世紀的謄寫和地權變換，使得原來有意義的地名變得難以理解。這個從語言學方法得出的假設，後來也從相關地域的古文書地籍史料得到旁證³。

綜合陳氏和服部氏兩家的地名研究方法論，我們可將綜合出以下的研究步驟。首先要收集研究主題的地名在不同地區出現的例子，再找出地名的讀音。這個步驟中最需要小心的部分是研究者對漢字望文生義的慣性，因為找出地名的讀音是此研究方法中的關鍵步驟，若用現代人的習慣解讀漢字的讀音，恐怕無法正確重建地名在歷史上的讀音，下一步依照讀音找尋意義時，便會發生困難或偏誤。

找出地名的讀音的下一步是找出地名的意義。有時地名的意義相當直白，例如「內埔」、「林尾」、「東門外」等等，有時卻源自現在已經不用的詞語，讓現代人感到晦澀難懂。此時我們就必須參考歷史文獻來找出其意義。這些文獻包括十九世紀傳教士杜嘉德 (Carstairs Douglas) 的《廈英大辭典》，巴克禮牧師 (Rev. Thomas Barclay) 的《廈英大辭典補編》⁴，以及任職於臺灣總督府的語言學家小川尚義的《臺日大辭典》⁵等用現代方法

² 服部英雄，《地名の歴史学》（東京都：角川書店，2000），頁 20。

³ 服部英雄，《地名の歴史学》，頁 24-26。

⁴ Douglas, Carstai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Taipei City: SMC, 1990[1873]); Barclay, Thomas, *Supplement to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Taipei City: SMC, 1990[1923]).

⁵ 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臺北：臺灣總督府，1932）。

編纂的辭典。但這些以現代方法編纂的字辭典皆不早於十九世紀中葉，離臺灣地名發生的時代約有一百年之隔。為了取得更接近地名發生時代的語料，我們還必須參考漳州和泉州的閩南語韻書和字書⁶、以及吳守禮稱為「什音全書」的《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⁷等等中國傳統文人使用的韻書、雜字。這些流傳在民間的語言史料更能反映先民創造地名時使用的語言。

除了參考語言學的資料，我們還需要透過地理學和歷史學的資料來檢證用語言學方法作出的假設。在地理學資料方面，二十世紀初測繪的《臺灣堡圖》是資訊最多、最全面的地圖⁸。它不只顯示地形和地名的對應，還用日文假名拼音為地名注音，讓我們可以和語言學資料對照。雖然《臺灣堡圖》的拼音未遵循當時已經制訂的標準，但仍有參考價值，不容忽視。除了以現代方法測繪的《臺灣堡圖》，清代繪製的各種地圖也提供相當多的地名資訊讓我們運用，雖然清代地圖沒有標註拼音，還是有助於我們收集全臺灣的類似地名，以及該地方附近的地貌。但地圖畢竟也只是某一個時間點的切片，方志和契字等文字史料才是保存地名歷史最重要的資料。近年古契字的整理和數位化為地名研究提供相當多的資料。土地買賣產生的契字一定會記載買賣標的物坐落的位置和交易時間，為我們留下地名的空間和時間紀錄，使我們有比地方志書更直接、可靠的史料來研究這些過去位於歷史書寫邊緣的地方⁹。

不過在運用新方法處理「大安」和「古亭」兩個地名之前，我們必須先回顧既有的地名研究者對這兩個地名源流提出的看法，並對照史料指出前人研究的問題，然後才用跨學科的研究步驟，從語言學、歷史學、地理學三個角度切入，提出新的說法。

⁶ 漳州和泉州雖然同屬閩南，但兩地分屬不同行政區，方言也有差異。十九世紀以前的兩地方言，分別可參考洪惟仁編著《漳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1993），以及洪惟仁編著《泉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1993）

⁷ 吳守禮，《什音全書中的閩南語資料研究》（臺北：吳昭婉，2006）。吳守禮校理的版本為日本宮內廳內閣文庫所藏抄本。另有一刻本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佚名，《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第32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3），頁313-366。

⁸ 近年有復刻本：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臺北：遠流，1996）。但在進行研究時，圖層套疊應用的工具是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來源：<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⁹ 本研究使用的契字主要來自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建置之「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http://thdl.ntu.edu.tw>）數位化的古契字資料，並儘可能與既刊史料核對。

二、「古亭」既非「穀亭」，也非「鼓亭」

現在的捷運古亭站是橘線和綠線的轉運站，為臺北南區的交通要衝之一。歷史上，古亭一直都是臺北、艋舺往文山、新店的交通要道，也是取水自新店溪上游的灌溉圳道流入臺北盆地時會經過的地方，而「古亭」在方志中也多次以這樣的身分出現。例如《淡水廳志》所收〈淡蘭擬闢便道議〉¹⁰提到林爽文事件(1787-1788)時計畫開闢的臺北宜蘭聯絡道路之路線，從艋舺武營南門出發後，五里就到「古亭村」。在《淡水廳志》的紀錄中，分別取水自景美溪和新店溪的霧裡薛圳和瑠公圳也流經古亭：

內湖陂，又名霧裏薛圳，在拳山堡，距廳北一百餘里。莊民所置。其水由內湖溝仔口、鯉魚山腳築陂鑿穿石門過規尾街、後溪仔口、公館街後通流，灌溉大加蠟西畔古亭倉、陂仔腳、三板橋、大灣莊、下陂頭及艋舺街一帶等田七百餘甲，至雙連陂為界。¹¹

瑠公圳，又名金合川圳，在拳山堡，距廳北一百二十里。業戶郭錫瑠鳩佃所置。其水自大坪林築陂鑿石穿山，引過大木規溪仔口，再引至挖仔內過小木規，到公館街後拳山麓內埔分為三條：其一由小木規至林口莊及古亭倉頂等田，與霧裏薛圳為界；¹²

這兩段文句都提到「古亭」，但詞尾從「村」變成「倉」，似乎有暗示此處為穀倉之意。

¹⁰ 陳培桂，《淡水廳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1871]），頁25-26。

¹¹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76-77。

¹²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76。「古亭倉頂」一語，如果依照《臺北縣下農家經濟調查書》中《淡水廳志》的引文，應該斷句為「古亭、倉頂」兩個地名。但「倉頂」不知是哪裡，疑為「坎頂」之誤。雖然日人之句讀不見得準確，但因調查書之作者身歷其境，比一百年後的研究者更有機會接觸到早期地名的使用，所以我們也不可忽略，在此姑且記之。見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臺北縣下農家經濟調查書》（臺北：日本物產會社活版部，1899）頁108。

加上日人片岡巖在《臺灣風俗誌》中斷言重傳統農家儲藏稻穀的「古亭笨」就是「古亭」的地名源起¹³，以致產生「古亭」係由於過去此處有「古亭笨」而得名的說法。這個說法，本文簡稱為「穀倉說」。洪敏麟在《臺灣舊地名之沿革》中亦根據前引《淡水廳志》「灌溉大加蠟西畔古亭倉」的記載認同此說，並強調「其地名既原有倉字，當因古亭笨而名。」¹⁴近年洪英聖則在《臺北市地名探索》中進一步藉由《臺灣堡圖》¹⁵古亭村庄轄下滿是水田，以及兩條圳道如《淡水廳志》所述流經該處而同意此說¹⁶。

不過上述引用《淡水廳志》對圳道的記載證明「古亭」源於「鼓亭笨」的說法中，其實忽略同一方志所收〈淡蘭擬關便道議〉對該處的描寫是「古亭村」，而且記錄的時間點就在清廷平定林爽文事變後不久，比《淡水廳志》早七十餘年。因此，以「古亭倉」作為最初的地名明顯不當。再者，在華語中「古」、「穀」兩字同音，但在閩南語中分別為 kóo 和 kok¹⁷，明顯不同音。而且從古契字的用字可知，「古」、「穀」兩字從未混用，反而是「谷」和「粟」經常取代較難寫的「穀」字。當我們擺脫漢字，直接觀察發音時，還可以發現「穀」只有在「五穀(ngóo-kok)」、「穀雨(kok-ú)」、「錢穀(tsâm-kok)」等詞中才讀作 kok，在單獨作為「稻穀」之義，以及寫作「谷」或「粟」時，都應該讀作 tshik，如「大租穀/谷/粟(tuā-tsoo-tshik)」。以上語音證據說明在語言學的角度中「古亭」源於「鼓亭笨」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其實，「穀倉說」在地理學和歷史學上也有問題。

洪英聖曾經運用《臺灣堡圖》證明古亭附近遍布水田，因此認為在這個交通要衝設置穀倉為自然之事。但其實在《臺灣堡圖》中，臺北盆地南部從古亭到六張犁都是水田，此處的水田並沒有任何特殊之處，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古亭西南方到新店溪畔一塊空白無水田的區域(圖一)。這塊區域大約是今日和平西路、同安街、水源快速道路、泉州街圍起來的地區，在日本時代中期的都市計畫中成為住宅區，但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即

¹³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頁 277-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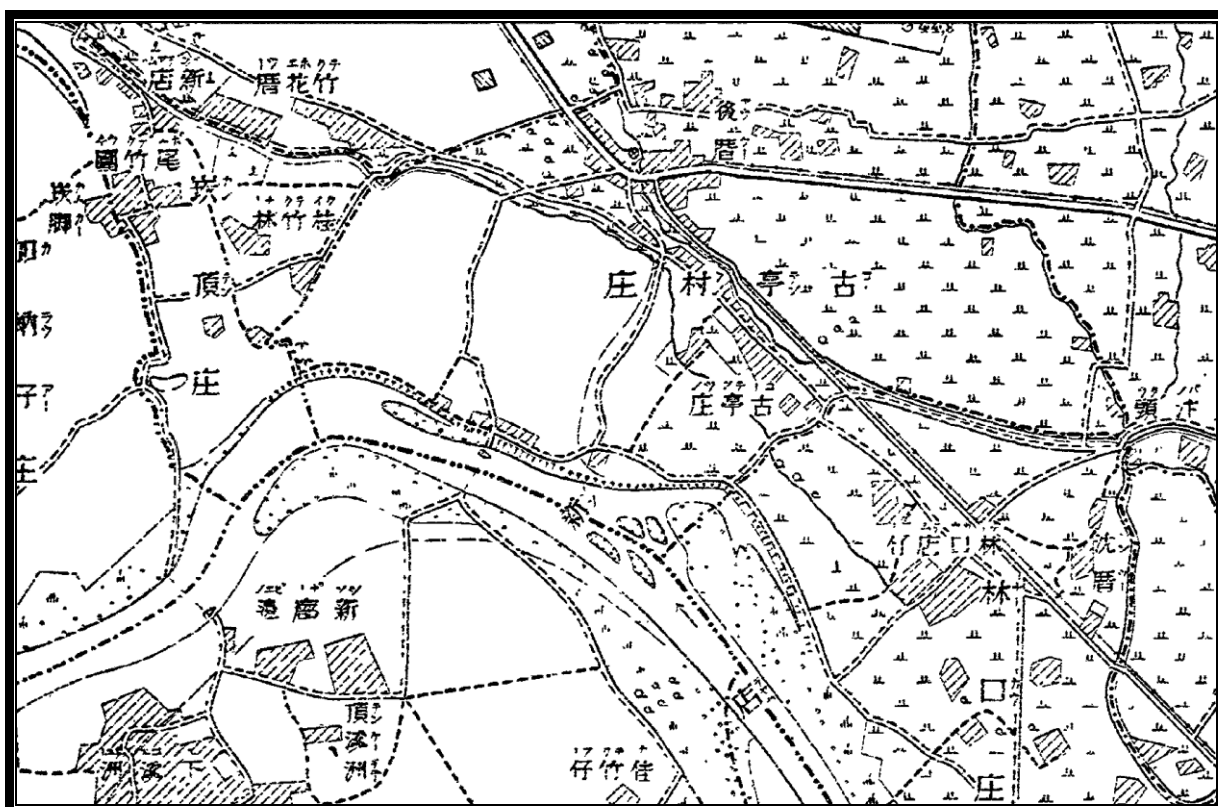
¹⁴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0)，頁 209。

¹⁵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臺北：遠流，1996)。「臺北」一幅為 1904 年調查製作。

¹⁶ 洪英聖，《臺北市地名探索》(臺北：時報文化，2003)，頁 27-42。

¹⁷ 「古」見 Douglas, *ibid.*, pp.230-231；「穀」見 *ibid.*, p.243。本文的拼音統一採用「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臺羅拼音)。

《臺灣堡圖》調查繪製的年代，此處顯然不是適合耕作的地方。因為這裡正好是新店溪曲流的凹岸，侵蝕力強，在未建築堤防之前都不適合農業在此發展。如果在這附近設置穀倉，很可能一次大水就將穀倉沖毀，對農家而言風險太大。



圖一：《臺灣堡圖·臺北》局部。注意古亭庄和頂庄間的空白地，位於新店溪凹岸，也沒有水田。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來源：<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除了地理學上的證據說明古亭附近並不適合設置穀倉，鼓亭笨本身也不是用來儲存大量稻穀的倉庫，它通常僅供一戶人家使用。用來儲藏大量稻穀的穀倉，應該像《淡水廳志》所記載的艋舺義倉，該義倉為合院式建築，正廳作為義學，稻穀等物資儲藏在兩側廂房¹⁸。若古亭真的是「倉」，它的型制應該會接近艋舺義倉，而非如洪敏麟所言「設置眾多穀倉『古亭笨』」的樣子。再者，《臺灣省通志稿》對臺灣農家儲藏用具的調查中，鼓亭笨分布在臺灣中南部的平原，在臺北則較多用可以收在屋內的「笨仔」或「笏條」¹⁹。而且鼓亭笨多設置在住宅旁，為一附屬建物，似乎較少獨立並群聚設置。池永歆對嘉義地區的鼓亭笨的調查也發現，鼓亭笨會設在離水的高處，而且和住宅成為一個整體，不會孤立存在²⁰。1963年美國攝影家梁莊愛論在彰化的記錄，一個鼓亭笨設在三合院右護龍前端，也可證明這點²¹。

檢討完古亭地名源起的「穀倉說」後，我們再繼續討論第二種說法「鼓亭說」。「鼓亭說」認為「古亭」源於漢人防禦原住民攻擊，作為哨戒用的「鼓亭」。臺北市文獻會在古亭長慶廟前設置的「鼓亭庄舊址碑」就採用這個說法。臺北市文獻會在1987年舉辦的耆老座談會中，以學者身分列席的林衡道雖然同時舉出「穀倉說」和「鼓亭說」兩種論點，但文獻會的訪談問題中卻已經預設「鼓亭說」為正確答案，而地方耆老也反應熱烈，舉出許多防範盜賊的往事，似乎可作為支持「鼓亭說」的證據。但細究其回憶的內容，會發現這些事情多發生在十九世紀末，離古亭最初出現在文獻上的時間已有百年之隔，而且耆老對設置鼓亭的地點和時間各執一詞，毫無交集。可見「鼓亭說」雖然有一定的「民意基礎」，但這反映的是別的史實，即日清統治之交，北臺灣盜賊蜂起，人心惶惶的事實，無法作為古亭地名源流的證據。除此之外，雖然許多人都提到周家為古亭的大戶，但受訪耆老卻無一人與周家有關。這反映古亭地區外來人口眾多，容易沖淡對地名源起的記憶²²。

¹⁸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54。

¹⁹ 陳正祥等，《臺灣省通志稿經濟志農業篇》（臺北：捷幼，1999[1954]），頁138-139。

²⁰ 池永歆，〈嘉義地區農家傳統穀倉：一個人文生態學的初探〉，《地理教育》18期，1992.06），頁207-212。

²¹ 梁莊愛論，《六〇年代臺灣攝影圖像》（臺北：藝術家，2002），頁160。

²² 林萬傳，〈古亭區耆老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82卷（1987.12），頁1-16。

進一步檢查《臺灣文獻叢刊》所收書中有關「鼓亭」的記載後，我們還會發現「鼓亭」不是設在軍隊駐地的門外，就是寺廟旁的儀典用鼓亭，亦為附屬建物，無獨立設置之例。再者，民間為了防禦而置一大鼓似乎不大經濟，而從臺灣道徐宗幹(1847-1854 在任)重申前臺灣道姚瑩(1837-1843 在任)對地方頭人的指示可知，「鳴鑼大呼」才是民間常見的方法²³。

其實早有人批評臺北市文獻會在 1983 年所立的「鼓亭庄舊址碑」。尹章義指出鼓亭在 1889 年劉銘傳「理番」後才失去作用的說法與漢人拓墾史不合²⁴。我們再對照《乾隆臺灣輿圖》和《臺灣民番界址圖》²⁵也可發現，十八世紀中葉漢人拓墾的腳步就已經到達今天的新店碧潭，甚至更靠山的新店安坑一帶。1753 年郭錫瑠已經為了在新店青潭溪設置水圳的取水口而與原住民交戰。可見《乾隆臺灣輿圖》中雖然有「鼓亭村」的記載，但原漢衝突的前線早已前進到新店一帶。由以上檢討，我們可說「鼓亭說」雖然在地方共同記憶中有其地位，但無法用來解釋「古亭」的地名源起。

三、撲朔迷離的「大安」

以上對「古亭」地名源流的兩種舊說所做的檢討，點出一般流行的說法只要重新檢視史料，就會發現還有許多可議的地方。研究者對史料沒有全面的掌握，僅從個別資料來推斷地名的緣起，再加上對地名望文生義的慣性，都是讓解釋地名源流和重建早期地方史功敗垂成的原因。此外大城市外來人口眾多，地方記憶不易保存，恐怕也是有問題的舊說一直沒有被挑戰的原因。接下來本節將討論臺北市內另外一個高知名度，但地名源流撲朔迷離的地名：大安。

地名研究者歷來對「大安」的源起有三種說法，分別可稱為「大安圳說」、「安溪說」，

²³ 徐宗幹，〈諭各社家長〉，《治臺必告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1867]），頁 365-366

²⁴ 尹章義，〈臺北市二十方古蹟碑文之商榷：兼論臺灣古蹟史實研究之危機〉，《臺北文獻直字》82 卷(1984.04)，頁 1-21。

²⁵ 《臺灣民番界址圖》（臺北：南天，2003[約 1760]）。

以及「大轉彎說」。其中「大安圳說」顯然將位於海山地區，由漳州人林成祖開闢的大安圳，以及因該圳而名的「大安寮」與臺北市內的「大安」混淆。此說最早出自安倍明義的《臺灣地名研究》，後來被洪敏麟在《臺灣舊地名之沿革》中引用，還進一步補充林成祖修築的大安圳，又述及聚落初稱「大安寮」的說法²⁶。不過《淡水廳志》已經明確記載林成祖發起興建的大安圳在擺接堡，灌溉範圍最遠到達港仔嘴庄，即今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一帶²⁷。流經今日臺北市大安區的圳道是瑠公圳和霧裡薛圳，其中瑠公圳在古契字中也被稱作「青潭大圳」或「大坪林圳」，皆與上游水源有關。《淡水廳志》記載霧裡薛圳又名內湖陂，也非大安圳²⁸。由此可知「大安」得名於「大安圳」是完全錯誤的說法。有趣的是，洪敏麟在論及板橋地區的地名源起時，同樣將大安圳納入枋橋街(今新北市板橋區)的沿革中²⁹，卻沒發現擺接堡的大安非大加蚋堡的大安。洪英聖在《臺北市地名探索》中更進一步說大安圳是瑠公圳的支流³⁰，可能是誤以為將瑠公圳的大安支線就是大安圳。該支線自今臺大校園中從主幹線分出，流經和平東路 96 巷和 175 巷³¹。可是《臺灣堡圖》中並沒有這條圳道，顯然是日本時代才開闢的。「大安支線」得名於它流經的大安庄，而非大安庄得名於該圳。

上述「大安圳說」的錯誤似乎也影響到林衡道對「大安」地名的看法。在古亭區耆老座談會中林衡道提到「大安區過去叫大安寮，大安寮就是偉大的安溪人的住宅的意思」³²。由於早期開墾大安區的漢人多來自中國福建省安溪縣，有名的安泰堂林家，祖先也來自該地³³，使「安溪說」似乎有可能是「大安」的地名源起。但是從語音來看又有疑義。假如「偉大的安溪」為正確的字源，「大安」就應該讀作 *tāi-an*，「偉大」的「大」應讀文言音 *tāi*。但《臺灣堡圖》中所記大安庄的讀音為「トアアン」(*tuā-an*)，「大」讀白話音。由此

²⁶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頁 207。

²⁷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75。

²⁸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76-77。

²⁹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頁 279。

³⁰ 洪英聖在《臺北市地名探索》，頁 188。

³¹ 瑠公水利組合，〈瑠公水利組合區域圖〉，(來源：

http://webgis.sinica.edu.tw/map_irrigation/Canal_D02.html，2012 年 1 月 30 日瀏覽)。

³² 林萬傳，〈古亭區耆老座談會紀錄〉，頁 3。

³³ 王世慶，〈臺北安泰堂之家譜與古文書〉，《臺北文獻直字》第 47/48 卷(1979)，頁 1。

可知「偉大的安溪」並不是真正的源起。

「大轉彎說」則認為「大安」來自「大灣」，即瑠公圳在此有一個大轉彎，故名之。《臺北市志》進一步指出「大灣」是瑠公圳在蟾蜍山腳下的九十度大轉彎³⁴。蓋郭錫瑠開闢瑠公圳在臺北盆地的漢人開墾史中是件大事，也留下「梘尾(今景美)」、「大圳墘(芳蘭路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附近)」兩個地名。若把日本時代併入的瑠公水利組合的霧裡薛圳算入，整個灌溉系統在今天大安區中還留下「九汴頭(溫州街辛亥路口附近)」、「草花汴(臺大行政大樓附近)」、「水梘頭(辛亥路復興南路口附近)」等等與灌溉圳道有關的小地名。所以對照大安區之地理環境，「大轉彎說」似屬合理。

其實不然。「大灣莊」早在 1741 年就出現在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³⁵。瑠公圳在蟾蜍山下的大轉彎，要等到 1760 年後瑠公圳通過萬盛庄進入大加蚋堡才會出現³⁶。一個出現在 1741 年文獻的庄頭，要如何依據 1760 年以後才出現的大轉彎命名呢？另有一說認為「大灣」源於今大安區和信義區交界的大陂，其彎曲狀造成「大灣」之名³⁷。但從《臺灣堡圖》上來看，梯型的大陂相較於下埤頭倒 S 形的下陂而言並不彎曲。

經過以上對三種大安地名源流的檢討，我們可說既有的三種說法都是不可靠的。能夠確定的僅有「大灣莊」的確是在文獻上出現的庄頭。但是「大灣」何時變成「大安」，或是「大灣」是否真的是「大安」的前身，其實也是必須透過史料重新檢驗的細節。現有地方志書與民間契約文書中與「大灣」、「大安」有關的文獻，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王世慶整理的〈臺北安泰堂之家譜與古文書〉³⁸。事實上，安泰堂林家在嘉慶與道光年間在今天臺北市大安區一帶廣置地產，後來鬮分財產時這些地產的坐落都詳載於鬮分契中，提供

³⁴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臺北市志·卷一沿革志封域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7-1991年)，頁 99。

³⁵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41])，頁 80。

³⁶ 瑠公圳的工程進度在 1760 年時都還沒到達蟾蜍山以北。1760 年郭錫瑠與萬盛庄的廖簡岳、鄧宜生立約開闢經過萬盛庄的圳道。萬盛庄在蟾蜍山以南，是瑠公圳進入大佳臘堡前的最後一個庄頭。相關合約見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 216。

³⁷ 湯熙勇編，《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頁 72。

³⁸ 王世慶，〈臺北安泰堂之家譜與古文書〉，頁 1-67。

地名研究者許多方便。王世慶也據此導出「大灣」在道光初葉改稱「大安」的看法³⁹。蓋所有與安泰堂林家有關文書中，僅有一筆 1805 年(嘉慶 10 年)的交易使用「大灣庄」的地名，1827 年(道光 7 年)至 1850 年(道光 30 年)四房正記鬮分之間都不見「大灣庄」，反而出現許多坐落於「大安庄」的田產，故王世慶的推論有其道理。

不過我們也看到遲至 1871 年出版的《淡水廳志》都還只有「大灣莊」⁴⁰而無「大安莊」。這我們或許可用廳治遠在竹塹，對臺北盆地的認識趕不上開發的速度來解釋。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大灣」的地名一直到 1884 年都還出現在古契字中。在現有文獻中，較早出現的「大灣」與晚出「大安」有五十七年的時間重疊，時間之長仍足以讓我們懷疑「大灣」和「大安」是否為兩個不同的地方？

這個問題的線索可以在一場跨越兩個政權的訴訟中找到。這場訴訟的兩造分別是大陂(位於今仁愛圓環與延吉街之間，呈西北——東南走向)上游大安庄的合股戶金晉安與下游以貢生李秉均、業戶林本源、張怡記為首的上陂頭等五庄。起因是上游的大安庄人主張有權利在大陂內的浮復地開闢農田，但此舉影響到下游五庄的水源，使下游五庄人拆毀大安庄人新築的田岸，造成雙方對簿公堂。最後由淡水縣正堂發布曉諭禁止在大陂中的新生地開闢田地或堵塞大陂水道。不久臺灣割讓日本，1900 年金晉安的後人又再度主張對大陂的權利，促使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著手研究附近各庄的邊界判定問題。因為這場訴訟而進行的土地調查和證物提供許多當地地貌和發展史的資料，但現在我們要先看大安庄方面的主張，這有助於我們解答「大灣」和「大安」之間的關係。

根據 1900 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大龍峒派出所所作的報告〈庄界判定ノ義ニ付伺〉⁴¹，我們知道大安庄的金晉安方面提出私人的土地買賣契約主張對大陂的權利，所以自認可以自由耕種大陂中的浮復地。他們最早的契字出自道光年間，目前未見這份契字，但它應該屬於 1860 年金晉安承買王義廣地產時一併轉交的上手契之一。這份 1860 年的〈咸豐十年

³⁹ 王世慶，〈臺北安泰堂之家譜與古文書〉，頁 45。

⁴⁰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61。

⁴¹ 〈庄界判定ノ義ニ付伺〉，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00003-od-ta_04241_000196-0001-u.xml〉。

立杜賣盡絕根大坡地坵田園埔地契〉將標的物記載如下：

王義廣等，因先年有自置得郭家遺管上陂頭大陂地，及內外草坵浮復洲堵業產。及已墾、未墾田園埔地連成共壹所，貫在大加蚋堡土名上陂頭大灣庄洲堵，年配納奇武卒番業戶馬天良大租粟貳拾石正，供粟貳拾石正，歷掌無異。其現管四至界址，東址興雅庄車路崁腳為界；西至雷社番內埔庄界；南至山腳大圳下為界；北至大陂岸外田為界。四址界址明白，併帶陂岸頂店仔地基數十坎在內。⁴²

上文「大灣庄洲堵」說明這個標的物位於大灣庄內，但是 1894 年淡水縣正堂的曉諭⁴³和 1900 年的〈庄界判定ノ義ニ付伺〉都以「大安庄」稱呼金晉安這方的土地。由於土地是固定的地標，因此我們可知 1860 年契字上的「大灣庄」與 1894 年曉諭中的「大安庄」是同一地，「大安」取代了「大灣」成為被公認的地名。我們還有另一組契字可以進一步支持「大安」取代「大灣」的事實。1829 年林本記承買吳笑來坐落「大灣庄牛磨車」的土地⁴⁴，在 1888 年劉銘傳清賦發給的丈單中以「大安庄」標示其坐落⁴⁵。土地也是固定的，由此可知「大灣」和「大安」為同一地，且在劉銘傳清賦時官方才正式承認「大安」取代「大灣」成為此處的新地名。

四、「大灣」新考：望文生義的危險

確認「大安的前身是大灣」對地名研究的方法論有相當重要的啟發。王世慶早年運

⁴² 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頁 184。

⁴³ 〈曉諭為出示立碑禁止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00003-od-ta_04241_000205-0001-u.xml](#)。

⁴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北部地區古文書專輯》第一冊（南投縣：臺灣省文獻會，2000），頁 138。

⁴⁵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北部地區古文書專輯》第二冊（南投縣：臺灣省文獻會，2000），頁 119。

用地方私文書獲得的結論，可以和後來新發現的史料互相核實，並說明官方編纂的地方志反而資訊落後，可信度大打折扣。前文探討過的「古亭」、「大安」地名源流，其實也是早期研究者依據可疑的地方志史料所做的推論。對現在有更多史料可供運用的研究者而言，除了重新檢討早年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運用跨學科的新方法提出新的論點。

從字面上來看，「大灣」一詞似乎和地形有關，所以從界定大灣的可能範圍，然後在此範圍內尋找可能被當作地名來源的地形是可行的切入點。臺北市的「大灣」作為墾庄的名字，早在 1741 年就出現在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但目前最早的契字卻只到 1776 年，離方志的記錄已經有三十多年之遠。我們注意到大灣庄的契字經常會提到田地灌溉用水的來源，其中 1825 年的一份契字則用到瑠公圳和霧裡薛圳兩條灌溉系統的水源⁴⁶。另有一則 1829 年的契字，其田地雖然使用瑠公圳水，但西界在霧裡薛圳⁴⁷。由以上契字我們可知，大灣庄的範圍介於瑠公圳和霧裡薛圳之間，而現在被稱為六張犁的地方在十八世紀也可能是大灣庄的一部分。因為在臺北盆地東南側與丘陵的交界處過去曾有一系列大小不一的陂塘，是大型灌溉圳道尚未開闢前臺北盆地農民的主要水源。現在這些陂塘雖然大多已經不存在，但仍留下許多相關地名。例如在六張犁的淺山中就有陂腹、柴頭陂兩個明顯與陂塘有關的地名，鄰近的三張犁有舊陂和新陂，再遠一點還有後山陂、永春陂等等。其中柴頭陂就是郭錫瑠最初使用的灌溉水源，後來不敷使用才開始嘗試從新店溪上游引水灌溉⁴⁸。由此可知，靠近山腳水源的六張犁一帶應比遠離水源的平原更早開發⁴⁹。但是現有第一張提到「六張犁庄」的契字晚至 1839 年才出現⁵⁰，據此我們可推測大灣庄最初應該也包括今天的六張犁。除此之外，

⁴⁶ 「全立合約字人 林翼彬、陳有再等。緣陳有再等，有承先明買蔡猛田壹所，又承買顏興老田壹所，坐落土名大加臘大灣庄，連大洋及洋仔，合共肆段。其東西四至界址，及竹圍、厝等項，俱登載上手契內明白，配大坪林、霧裡薛大圳水通流灌溉。」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二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3），頁 42-43。

⁴⁷ 「立杜賣盡根契人吳笑來即吳有成。有於道光元、貳等年，前後明買過……一在小水圳腳水田壹段，東至自己小水圳并吳家田為界，西至霧裡薛水圳并林家田為界，……帶大坪林青潭埤水參甲通流到田灌溉。」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集》，頁 170。

⁴⁸ 劉育嘉，〈清代臺北盆地的水利開發〉，《臺灣文獻》47 卷 3 期（1996 年 9 月），頁 195。

⁴⁹ 可比較蘭陽平原的漢人拓墾過程，初期也是先沿山邊湧泉帶推進。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及其人文生態意義〉，《空間》62 期（1994.9），頁 104-107。

⁵⁰ 「立杜賣盡根契人高鍾程先年有自明買得黃永吾、爐木等水田壹所、山埔貳片，坐貫大加納保土名六

契字中「大灣」也曾和「林口庄」同時出現，似乎表示林口庄(捷運公館站附近)也可以被當成大灣庄的一部分⁵¹。根據以上資料，我們可以大致推斷出十八世紀的大灣庄，其北至今市民大道，東至六張犁；往南有可能至新店溪，但保守估計只到今天的臺大校園，西界則為今復興南路。接下來，我們就要在這個範圍內尋找「大灣」的可能來源。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灣」在地名中的意義。根據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灣」有「海灣」和「河流轉彎處」兩個意思⁵²，而小川尚義編《臺日大辭典》只收錄「海灣」一義⁵³。不過在臺灣的地名中，「灣」還表示三面環繞高地，一面開口的低平地，常被用在命名開闊山麓谷口的聚落⁵⁴。例如在臺北縣林口鄉就有「大南灣」、「小南灣」兩個從十八世紀中就被命名的地區⁵⁵。在上述推定的大灣庄地界中，今天被稱為六張犁的地方正好符合以上定義。而由以上語言學和地理學的角度推論，今天的六張犁很可能是早期漢人移民較可能落腳開發的地方，而此處的地形正好適合用「灣」描述之。

在此我們還可以深入探究一下發音，這或許可以提供「大灣」變成「大安」的線索。在中國閩南地區還有三個有「安」的地名，分別是過去屬於泉州府的「同安(tâng-uann，臺羅拼音<nn>表示鼻化韻母)」、「南安(lâm-uann)」和「安海(uann-hái)」。這提醒我們「安」除了讀作 an 以外，亦可讀作 uann⁵⁶。根據巴克禮(Thomas Barclay)加上漢字的《補編》⁵⁷，以及小川尚義的《臺日大辭典》，我們知道 uann 可以寫作「垵」，當動詞時是「靠岸」，當名詞時是「港灣」的意思⁵⁸。其實 uann 作「靠岸」時，亦可以寫作「灣」。例如《臺海使槎錄》就提到在澎湖停靠時需要注意的事：

張犁庄。」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10001-od-tcta0018_4-0001-u.txt〉。

⁵¹ 〈全立歸就盡根田契字人德昌號〉，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00100-od-002591672-001-n.txt〉。

⁵² Douglas, *ibid*, p.348.

⁵³ 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上卷（臺北：臺灣總督府，1932），頁 148。

⁵⁴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頁 79。

⁵⁵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77。

⁵⁶ Douglas, *ibid*, p.347.

⁵⁷ Barclay, *Supplement to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p.161.

⁵⁸ 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上卷，頁 140、804。

澎湖灣船之澳有南風、北風之別；時當南風誤灣北風澳，時當北風誤灣南風澳，則舟必壞。⁵⁹

很明顯，此處的「灣」是動詞。雖然黃叔瓚是順天府大興人(今北京市)，說的語言不是閩南語，但「灣船」這個動作要是讓閩南人來說，應該也會是 uann-tsûn 吧。以上分析可知，uann 有「灣」和「坵」兩種寫法，可以作動詞，意思是船隻停泊，亦可作名詞，即船隻停泊的港灣。事實上，澎湖還保留有「內坵」、「外坵」，還有從「網坵」雅化的「望安」。不只在海邊，陸地上也有「坵」的地名。今天辛亥隧道的景美端出口在《臺灣堡圖》中稱作「保生坵」，契字上亦作「報生坵」⁶⁰。以上資訊，足以讓我們想像臺北市的「大灣」早期是不是也讀作 tuā-uann？

可惜不是。在臺灣其他地方也有「大灣」的地名，分別在臺南市永康區和學甲區、高雄市仁武區，以及雲林縣麥寮鄉，四處地名都還保留原貌，在臺灣堡圖上的注音也都是「トアワン(tuā-uan)」，而非 tuā-uann。在地形上，這四處也不是位在開闊山麓谷口的聚落⁶¹。我們也沒有在現存史料中看到臺北市大安在歷史上有「灣>坵>安」的變化；他是在道光初葉突然間從「大灣」改成「大安」。這些語言學證據使我們必須放棄前面將臺北市大灣的「灣」解作「三面環繞高地，一面開口的低平地」的看法，重新開始尋找線索。

語言學證據可以否決舊的假設，但也可以提供新的資料。前言中提及的泉州方言韻書《彙音妙悟》，這本書除了讓使用者依照讀音查字，也提供簡單的釋義。在「灣(uan)」的同音字中，我們可以發現與地形有關的字除了「灣」以外，還有「淵」，編者注解為「土[音]；水也；水出不流曰淵」⁶²。這個詞在漳州方言最早的韻書《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並沒有出現，但在以前者為基礎擴編的「增補彙音」才有。不過在此它不是寫作「淵」，

⁵⁹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12。

⁶⁰ 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三集》，頁 476。

⁶¹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臺北：遠流，1996)。「臺北」一幅為 1904 年調查製作。

⁶² 黃謙，《增補彙音妙悟》，收錄於洪惟仁編著《泉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1993)，頁 164。

而是列在「灣」底下的第二個意思：「水曲；又池名」⁶³。這兩本漳泉韻書的對 uan 這個字的安排可以作如下解讀：uan 在閩南語中有水池的意思，但在十九世紀初這兩本韻書編纂時，這個用法已經越來越不通行，也沒有固定的寫法(或是用傳統術語解釋為「音字脫節」)。《彙音妙悟》的編者認為這個詞素有音無字，所以借用音近的「淵(ian)」來代表這個詞素。「增補彙音」的編者不想借字，或是知道作為水池的 uan 習慣寫作「灣」，故列於「灣」之下，不另借字。而作為水池的 uan 這個詞也的確在衰退中，到了十九世紀末杜嘉德編《廈英大詞典》時，這個用法已經消失了。

但是「大灣庄」這個地名早在 1741 年就已經出現在文獻上，此時作為水池的 uan 應該還是通行的意義之一。從地理和歷史的角度看臺灣的五個大灣。臺南市學甲區大灣地近倒風內海，雲林縣麥寮鄉大灣雖文獻不徵但也近海，這兩個大灣都不難以海灣來解釋。其他三個大灣相對靠近內陸，明顯與海灣無關。這三個內陸大灣中，臺南市永康區大灣是最早有文獻記載的，1700 年前後成立的《康熙臺灣輿圖》已經有「大灣塘」的記載，位置在鯽魚潭的東岸⁶⁴。鯽魚潭是早年臺灣府城東方有名的漁業和遊憩據點，1752 年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將「鯽潭霽月」列為八景之一⁶⁵。高雄市仁武區大灣出現在文獻上的時間也在 1720 年，該年刊行的《鳳山縣志》列舉境內關帝廟時提及一座位於「半屏山大灣」。這附近也有名為「草潭」的水池，為灌溉用水和漁業據點⁶⁶。至於臺北市的大灣，也有一座從今天忠孝東路復興南路口向東南延伸到信義路光復南路口的大陂，和瑠公圳、霧裡薛圳一起灌溉新店溪和基隆河間的平原。但問題是，如果這個大陂是瑠公圳的一部分，它有沒有可能是瑠公圳完工以後才出現的？如果是，那在瑠公圳完工前就已經出現於文獻的大灣庄就不可能以大陂命名。

其實大灣庄的大陂應該是從臺北盆地中的自然湖泊改建的灌溉設施。根據《臺灣堡

⁶³ 佚名編，《增補彙音》，收錄於洪惟仁編著《漳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1993）。見卷二第 20 葉左。

⁶⁴ 翁佳音、石文誠、陳佳慧，《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頁 33。

⁶⁵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52]），頁 27。

⁶⁶ 陳文達，《鳳山縣志》，頁 161。

圖》，大陂的上游是來自六張犁的兩條溪流，下游則蜿蜒流經上陂頭庄、下陂頭庄、中庄仔庄等地(皆在今天中山區境內)，分成兩條支流，其中一支流入雙連埤，另一支最後注入基隆河⁶⁷。日本時代的調查，大陂下游五庄的業戶和佃戶為灌溉用水合作修建大陂(調查的官員稱為「上埤」)，並提及 1895 年淡水縣正堂禁止開墾陂底浮復地的曉諭⁶⁸。但是這份報告提及的建設時間有許多問題。報告稱這座大陂是在咸豐年間由庄民合築，但在道光年間的《淡水廳志稿》就已經有「上陂頭陂」的記載⁶⁹。其實還有更早的文獻提到這座大陂。1745 奇母子社原住民招攬漢人到「大佳臘南勢內埔仔」伐木開墾，契字中指明「北至大陂尾坐埔為界」。這片已被砍伐的森林的遺跡還留在「林口庄」(今捷運公館站附近)和「林尾」(今成功國宅北側)兩個地名上⁷⁰。「林尾」的地名位在北邊，可見契字中「大陂尾坐埔」也在這附近。

在《臺灣堡圖》測繪的年代，林尾離大陂已經有一段距離，顯示這一百五十年間大陂中屢有浮復地。大陂岸邊還有「陂心」這個地名，標示這個聚落是立基在大陂的浮復地上。然而對大陂下游五庄的農民而言，大陂的浮復地會減少下游灌溉水源的儲備，因此大陂淤積對他們相當不利。史料上稱業佃合作修建大陂，意思應該是疏濬大陂以維持儲水，而非費力挖掘一座全新的陂塘。再從機會成本來看，一塊地被闢為陂塘就不能當農田。不論是道光或咸豐年間，瑠公圳和霧裡薛圳都已通水數十年。如果大陂下游五庄需要灌溉用水，何不直接付水租向既有圳道買水就好？因為大陂是自然形成的水源，不需要納水租⁷¹。因為沒有水租，大陂沒有特定的管理人，只有受益者會輪流看顧水量。大陂的下游也是自然形成的河道。1900 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的報告指出大陂的上下游，雖有「陂」之名，但實際上卻像自然河流蜿蜒曲折。這樣的描述可以從《臺灣堡圖》

⁶⁷ 可以和 1900 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做成的調查報告〈庄界判定ノ義二付伺〉對照。該報告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00003-od-ta_04241_000196-0001-u.xml〉。

⁶⁸ 1913 年的〈調書〉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00003-od-ta_05710_000081-0001-u.xml〉。1895 年的〈曉諭為出示立碑禁止事〉，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00003-od-ta_04241_000205-0001-u.xml〉。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00003-od-ta_04241_000205-0001-u.xml〉。

⁶⁹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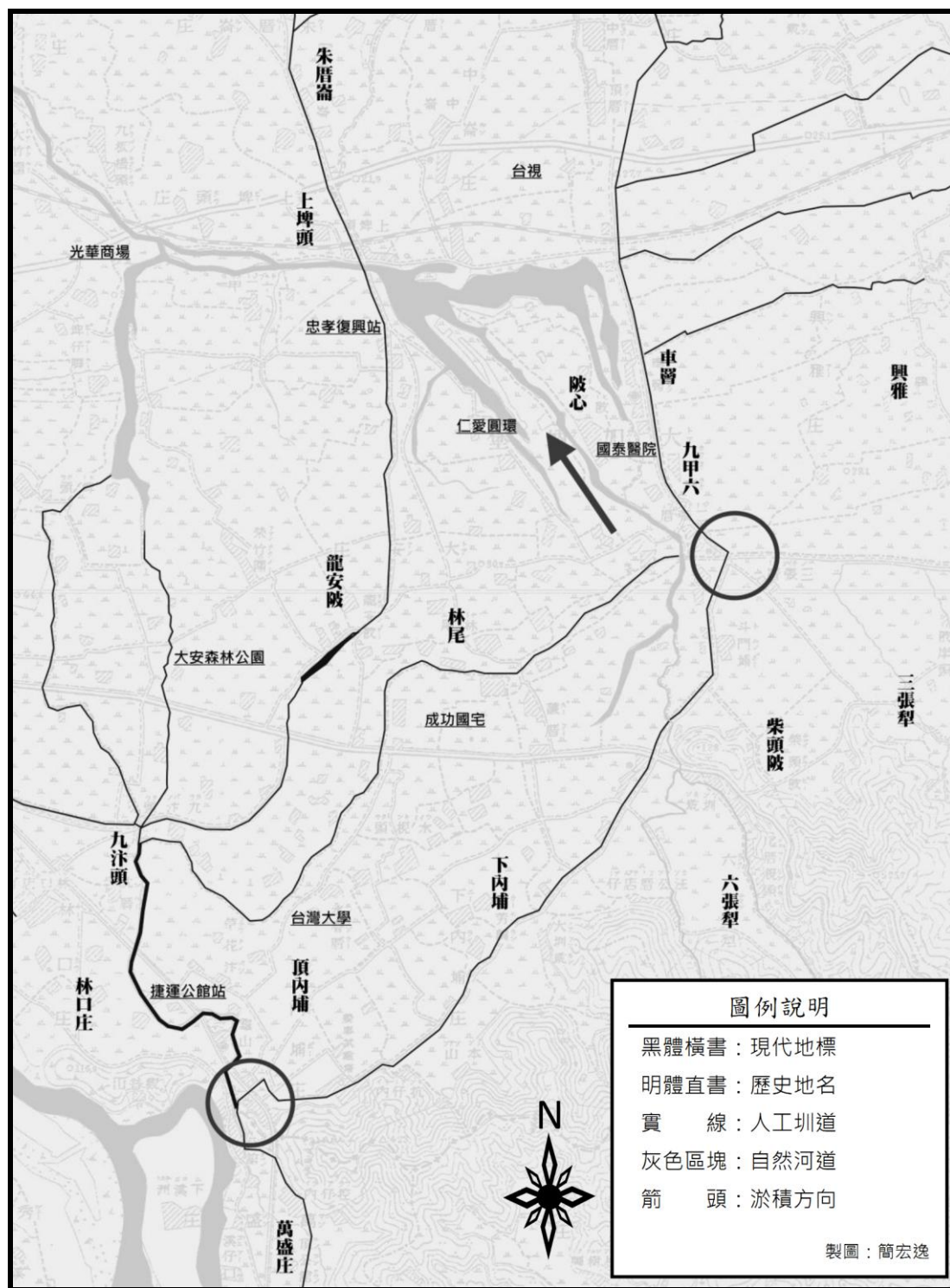
⁷⁰ 或許這就是 Thomas Pedel 在 1655 年沿著 Pinnoroang 河發現的大森林。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頁 486。

⁷¹ 1895 年的〈曉諭為出示立碑禁止事〉：「五庄各田向靠該處陂水灌溉，並無完納水租憑據。」

印證。如果大陂的下游是人工修築的圳道，它應該會盡可能走直線，用樹枝狀的方法分流進周邊的田地。人工修築的溜公圳和霧裡薛圳正是採取這樣分汴灌溉的設計。

從以上對現有文獻的分析，我們可知大灣庄的大陂雖然在漢人開發過程中成為灌溉系統的一部分，但前身是自然形成的池沼。這樣的地形與有鯽魚潭的臺南市永康區大灣，以及有草潭的高雄市仁武區大灣都是一樣的，在語言學上也符合大水池 tuā-uan 的語音和表記。這個由語言證據提出假設，再由歷史學和地理學方法驗證的地名源流，可以簡稱為「水池說」⁷²。

⁷² 《臺灣地名辭書：高雄縣》中，仁武區大灣的條目分為兩項，「村名由來」處說大灣聚落地勢彎曲，交通不便，出入須繞道而得名。這個說法與當地的平原地形明顯不合。但在「地名釋義」又說大灣得名於早期此處的大片水域。這個說法才是正確的，在此附帶一提。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輯，《臺灣地名辭書：高雄縣》13卷2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頁309。



圖二：本圖依據《臺灣堡圖》繪製。人工修築的溜公圳和霧裡薛圳繞過蟾蜍山，進入台北盆地後，採取樹枝狀分汴灌溉田地。自然形成的大陂在《臺灣堡圖》繪製的年代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淤積。但在十八世紀中，大陂的南緣應該接近圖中央的「林尾」。也就是說，「林尾」到「陂心」之間的田地是 1750 年代到 1900 年代這一百五十年間大陂中陸續淤積的浮覆地。兩處圓圈是傳統說法認為圳道「大轉彎」的可能位置。

五、「古亭」地名源流新考一：漁網說

我們已經為「大安」的前身「大灣」，運用語言學、歷史學、地理學的綜合方法考訂出新的地名源流：「水池說」。接下來要討論的是臺北市另一個充滿疑問的地名「古亭」。前文我們已經揭露，既有的「穀倉說」在語音和地理位置上站不住腳，而導出「鼓亭說」的史料也問題重重，不符合已知的臺北盆地開墾史。但能破也要能立，所以現在我們將運用新的方法，重新檢視舊有史料或發現新史料以建立新的說法。

首先我們發現臺灣北部還有兩個類似的地名，分別位在桃園縣大園鄉許厝港東北方的「古亭」⁷³。另一個寫作「鼓亭」，在新北市萬里區龜吼村，即野柳岬東南方的海岸⁷⁴。「鼓」是「鼓」的俗字，在閩南語中和「古」同音，所以這兩個地名可以與臺北市內的古亭一起考慮。但可惜這兩個小地名都沒有足夠的早期史料供我們參考，僅有兩張來自龜吼村的契字。所以我們暫時先回到臺北市內的古亭，從清代方志、地圖、古契字中找出它在文獻中最早出現的年代。

在清代方志中，臺北市的「古亭」最早以「古亭莊」之名出現在余文儀主修的《續修臺灣府志》中，其記錄的段限在 1765 年⁷⁵。大約同一時期，在《乾隆臺灣輿圖》中有「鼓亭村」的記載。雖然《乾隆臺灣輿圖》的記錄時間學界上無定論，但下限不會晚於 1767 年。而目前所知最早記有「古亭」的契字則是 1765 年的〈周捷周部周祥兄弟等全立定界各管合約字〉⁷⁶，契字中記載周氏兄弟向楊天賜買「厝地竹幃一所，址在大加蚋古亭村土名后厝爪匣口」。由以上三份資料可知，「古亭」的地名在 1765 年左右已經出現。那麼《乾隆臺灣輿圖》中的「鼓亭村」是否有可能讓前面被推翻的「鼓亭說」敗

⁷³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臺北：遠流，1996）。〈許厝港〉一幅為 1904 年調查製作。

⁷⁴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00003-od-ta_01829_000029-0001-u.xml〉。

⁷⁵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1764]），頁 77。

⁷⁶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10001-od-ntuda268-u.txt〉。

部復活呢⁷⁷？

我認為此處的「鼓亭村」並非真正的源起，反而可能是傳抄錯誤所致。因為《乾隆臺灣輿圖》其實也證明 1760 年代時臺北漢人的拓墾前線在至少已經到達今日新店大坪林一帶，與已知的漢人開墾史相符，且圖上「鼓亭村」附近的瓜匣社和雷裡社皆是收取番大租的大租戶，與漢人利害相戚，應該沒有經常性襲擊漢人的理由。再者，《乾隆臺灣輿圖》的資訊有太多顛倒倒錯的地方，並非相當可靠的史料。光以臺北盆地附近為例，《乾隆臺灣輿圖》有朱厝崙也有周厝崙，但《續修臺灣府志》只有周厝崙⁷⁸；瓜匣口庄的字面意義應該在瓜匣社附近，但圖中卻標在新店溪上游；文山地區的內湖，即今木柵，應該在霧裡薛溪(今景美溪)流域，但該圖卻也標在新店溪上游；又八里到南崁間的太平嶺、大南灣、小南灣、坑仔口庄(以上從東到西)，在圖上的排列卻剛好相反。以上略舉一隅，即可知《乾隆臺灣輿圖》的正確度值得懷疑。而且閩南語中「鼓」、「古」同音⁷⁹，更增加同音誤寫的可能性。

不過同音誤寫也有積極的解釋方法，因為它也可能是「同音多文」。例如現在屬臺北市信義區轄下的興雅庄，在《乾隆臺灣輿圖》中寫作「興雅撫徠」，1738 年的〈乾隆三年立合約字〉⁸⁰中作「興仔無徠」，1773 年〈一七七三年立再給墾批〉⁸¹中則作「興雅蕪內」。這明顯是「同音多文」的結果。如果古亭也是「同音多文」的結果之一，那更早的讀音 kóo-tîng 所代表的意義才應該是地名真正的源起。

那麼，kóo-tîng 到底意義為何？桃園縣大園鄉的「古亭」和新北市萬里區的「鼓亭」的地理環境可以提供若干線索。這兩個地方都靠海，很明顯不是適合設置穀倉的地點，但或許是個捕魚的好地方。《萬里鄉志》也提到該鼓亭過去設有罟寮，為放置漁網的地

⁷⁷ 在宜蘭壯圍鄉和苗栗縣苑裡鎮還有「古亭笨」的地名，但這個地名已經明顯來自儲藏稻穀的鼓亭笨，現有史料也沒有其他的表記顯示其他可能的地名源流，所以不列入本文的討論。

⁷⁸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77。朱 (tsu) 厝崙音近周 (tsiu) 厝崙。

⁷⁹ 「古」見 Douglas, *ibid*, p.231.

⁸⁰ 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集》，頁 87。

⁸¹ 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二集》，頁 29。

方⁸²。這提醒我們，臺北市古亭的地名源起可能也和漁網有關。

從更早的史料可以證明新店河流域在十七世紀就有漁業資源可供開發。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中指出荷蘭人所繪地圖中將新店溪上游有一處「鯪魚場」(Haeringh Visserij)⁸³。此處可能在今天中正橋到福和橋間的新店溪，其實相當靠近古亭⁸⁴。事實上，新店溪甚至整個淡水河流域的漁業資源到相當晚近都不斷出現在文獻中。荷蘭人在1655年記錄了新店溪上的鯪魚場。一百年之後，1760年梁亨梅等人在艋舺下崁庄下石路賣出的土地中有「魚寮」的記載；「魚寮」是加工魚獲和儲藏漁具的地方⁸⁵。再晚一點，1763年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提到「甲魚，又名傑魚；巨口細鱗，無刺，形如鯪，味甚美。長者可六、七寸，惟出上淡水武勝灣[sic]等社」⁸⁶。又過了一百年，1867年英國領事 Henry Kopsch 乘舟溯新店溪、景美溪而上至石碇楓仔林，途經古亭對岸的龜崙蘭，即今永和附近，也看到有人在附近捕魚⁸⁷。1907年橋本文三郎在古亭村庄新店溪畔設置，作為香魚垂釣休息處的「鮎小屋」失火，讓我們知道二十世紀初在新店溪還有人在此為釣魚而築屋⁸⁸。而從《臺灣堡圖》也可以看到在古亭對岸的永和有「網尾寮」和「網溪」等地名，都指出此處漁業的發達。

由以上史料可知，古亭附近的新店溪雖然位於內陸，自古以來仍然以漁業資源聞名，和大園鄉的古亭、萬里區的鼓亭有相同的地理環境。因此古亭的「古」很可能來自「罟」，而「罟亭」則可能是先民對「罟寮」的另一種稱呼。但漁人不像農人一樣需要土地耕作，不易留下相關文字記錄，以致「罟亭」的寫法為人遺忘，而在1765年左右被寫成「古亭」和同音且有既存詞彙的「鼓亭」，並以「古亭」傳世。以上推論或可簡

⁸² 薛化元、翁佳音，《萬里鄉志》（臺北：萬里鄉公所，1997），頁67。

⁸³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稻鄉，2006），頁82-84。

⁸⁴ 這樣的推論建立在將該地圖第26號比定為今天的公館觀音山（寶藏巖）或蟾蜍山。

⁸⁵ 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三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5），頁25。

⁸⁶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763]），頁95。《臺灣文獻叢刊》排印本與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抄本，「武勝灣」皆誤作「武勝灣」。感謝審查人提醒。

⁸⁷ Kopsch, Henry, "Notes on the rivers in norther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14, 1870, pp.79-83.

⁸⁸ 臺灣日日新報，〈鮎小屋失火〉，1907年11月22日（漢文）。

稱為古亭地名源起的「漁網說」。

當然，早年在這裡活動的漁民，可能不只有漢人，還有這裡最早的主人：凱達格蘭族。但早期紀錄告訴我們原住民尚未與漢人接觸時，並非使用漁網捕魚，而採用弓箭射水中的魚的方法。黃叔瓚《臺海使槎錄》中有〈射魚〉一詩記錄原住民是在與漢人接觸後才開始用魚網捕魚：

仰沫巨魚才躍波，矢無虛發巧如何！
於今苦學漢人法，篤筏施罟事轉多。⁸⁹

「罟」即「罟」，《臺日大辭典》中都用「罟」表示「罟」。但既然用網捕屬於漢人的技術，「古亭」或「鼓亭」在北臺灣又不只一處，且都可能演變自「罟亭」，故在此仍傾向推定「古亭」源自漢人漁業活動的地名「罟亭」，現在的寫法則是後來演變的結果。

六、「古亭」地名源流新考二：「孤壇」

以上將「古亭」的讀音解作 kóo-tîng，加上北臺灣的類似地名，讓我們導出「漁網說」。但我們也要回想一下在前言中所提及，服部英雄的錯誤。他原本以為「御正作」讀作 mishosaku，後來才知道讀錯，應該讀作 misosaku。如果「古亭」其實原本並不讀作 kóo-tîng，我們的推論必然要有所修正。其實一則比臺北的古亭更早的史料就提醒我們，在高雄市田寮區的「古亭坑」在 1720 年代被記錄下來時就不讀作 kóo-tîng。

1721 年在臺灣南部發生的朱一貴事變是清朝統治臺灣初期最大的一場動亂。清廷平定動亂後，被捕的人之中，陳成、康健、李孝、徐篷四人都供稱他們在康熙六十年

⁸⁹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ca. 1724]），頁 176。

三月十五日與朱一貴在「古陳坑」拜把。1722年黃叔璥來臺，在《臺海使槎錄·赤崁筆談》中也提到這個與朱一貴事變相關的地名，稱「甕菜岑、鼓壇坑尤為奸匪出沒之所」⁹⁰。此處的「古陳坑」和「鼓壇坑」後來改寫作古亭坑⁹¹。而比較「古陳(kóo-tân或 kóo-tân)」和「鼓壇(kóo-tân)」可知，這個地名在十八世紀初的閩南語中，唯一可能的讀音就是 kóo-tân 而非 kóo-tîng。事實上，《彙音妙悟》和《臺日大辭典》中都有收錄讀作 tân 的「亭」。《彙音妙悟》將這個字註為俗解，可見這是個借字，例詞為「涼亭」。

這樣看來，kóo-tân 似乎真的是古老的涼亭的樣子。但若是如此，為什麼最早兩次被寫下來的時候都不用「亭」這個字？再者，亭這種風雅的建築物，往往會列入地方志成為紀念性的建築物，並做為一種文明化的象徵。⁹²但為什麼這些「古亭」的地名都在偏僻的深山、水邊、海邊，也沒有列入方志？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為 kóo-tân 其實是別的東西，而且是只會出現在村庄邊緣的東西。我們可以先從可能作為詞頭(head)的 tân 開始找。從《彙音妙悟》的同音字表中可以找到「檀」和「壇」這兩個名詞詞素。如果 tân 就是「檀」，kóo-tân 可能就是「古檀」，也就是古老的檀木之意。這個推測看似有理，但考慮到高雄田寮有名的月世界惡地地形，桃園沿海發達的沙丘，還有萬里龜吼村契字中的「鼓亭砂崙界」就知道這幾個地方很難有古老的喬木，也不大可能有株古檀了。「壇」則是另外一個可能，《彙音妙悟》的解釋為「祭場也」。這個線索讓我們連想到「亭」在閩南語的世界中，也可以作為一種寺廟的名稱，例如臺灣各地都有的「觀音亭」便是一例。雖然「觀音亭」讀作 kuan-im-tîng⁹³，不是 tân，但觀音亭仍可當作思考時的啟發點(heuristic)。

⁹⁰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8。

⁹¹ 《臺灣地名辭書》認為高雄田寮的「古亭」是西拉雅族的地名，因為當地古契字顯示這一帶的土地是由西拉雅族新港社手中流入漢人手中。但本研究把地名放在更大脈絡下，同時考慮臺灣南部和北部的四個古亭時，高雄田寮古亭來自特定平埔族群的推論就可能不正確了。《臺灣地名辭書》對高雄田寮古亭的地名源流論述，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輯，《臺灣地名辭書：高雄縣》13卷2冊，頁159-160。

⁹² 臺灣方志中有許多例子，在此僅舉《淡水廳志·古蹟考·園亭》中的一例：「望海亭：在廳北淡水營盤後山之畔，都司王三元葺建，可以觀海。今圯。」陳培桂，《淡水廳志》，頁346。

⁹³ Schlegel, Gustav.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 *T'oung Pao*, Vol. 1, No. 5, 1891, p.396.

林美容發現屬於民間佛教的觀音亭特別強調中元普渡⁹⁴。另外大多主祀觀音，通常位於山邊的「巖仔」則經常有納骨塔或位置明顯的過世信徒牌位，亦有成為地方公廟的「巖仔」與同一祭祀圈的神廟出現「巖仔」主陰，神廟主陽的「陰陽共濟體系」。此外觀音「慈航普渡」的形象也和臺灣的漢人渡海而來，往往親人永隔，死無所依的歷史背景有關⁹⁵。既然觀音信仰與陰靈普渡息息相關，主祀觀音的寺廟常被稱為「觀音亭」（即使是「巖仔」，民間仍俗稱觀音亭。如臺北寶藏巖又稱臺北觀音亭），而「亭」和「壇」又可能同音，這樣的關係令人懷疑「壇」或許和陰靈普渡也有關係。

「壇」通常不是屋宇，而是高於平地的土臺。《鳳山縣志》描述山川壇的形制為「坐北向南，東西南北出陸各五級，不設石主」⁹⁶。這樣的形制可以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中的先農壇確認⁹⁷。其實高拱乾《臺灣府志》中就已經提及臺灣府城的各種祭壇，計有：社稷壇、山川壇、厲壇⁹⁸。厲壇對我們的研究格外重要。清代臺灣各級政府都設有厲壇，為祭拜無祀孤魂的地方，府城稱郡厲壇，縣城稱邑厲壇，此外還有人民自行設立的鄉厲壇。稱鄉厲壇或許令人感到陌生，其實這就是臺灣各地奉祀無主孤魂的陰廟，如大眾廟、有應公廟、萬善祠等等。無主孤魂的出現和漂流屍、社會動亂，或是地方長年使用的墳墓有關。漂流屍會出現在河邊和海邊，位於基隆河和淡水合會流處的臺北市社子島，就有許多因祭拜漂流屍而奠基的有應公祠⁹⁹。韋煙灶在新竹南寮進行的田野調查也顯示有應公廟和 1900 年代的海岸線有對應關係¹⁰⁰。北海岸還有十八王公廟這座因漂流屍奠基的知名廟宇。因此在海邊和河邊的古亭/鼓亭/鼓亭的確有可能出現漂流屍，當地人有機會為從海上或河川上游漂來的無主屍身設壇求平安。此外原住民的傳統不設

⁹⁴ 林美容，〈臺灣觀音信仰的主要型態——兼論民間佛教與民間信仰的關係〉，《臺灣文獻》59 卷 1 期（2008.03），頁 7-10。

⁹⁵ 林美容、蘇全正，〈臺灣的民間佛教傳統與「巖仔」的觀音信仰之社會實踐〉，《新世紀宗教研究》2 卷 3 期（2004.03），頁 25-28。

⁹⁶ 陳文達，《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20]），頁 42。

⁹⁷ 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43-44。

⁹⁸ 高拱乾，《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1694]），頁 180-183。

⁹⁹ 林月珠，〈都市傳說社子島：環境與民俗的邂逅〉，《歷史月刊》261 期（2009.10），頁 24-28。

¹⁰⁰ 張智欽、韋煙灶，〈新竹市南寮地區聚落變遷及變遷過程所顯現之人地關係意涵〉，《人文及管理學報》2 期（2005.11），頁 26。

墓碑，漢人發現的枯骨也可能是原住民所留下。臺北市古亭所處的新店溪沿岸，在 17 世紀中荷蘭人繪製的地圖上就有許多原住民村社。漢人在開墾過程中意外挖到原住民墓葬而設壇安頓，亦不令人意外¹⁰¹。《廈英大辭典》中也收錄 *bô-sû-tân* 一詞，意思是祭拜無後代者牌位的地方，提供另一個支持 *tân* 和無主孤魂有關的證據¹⁰²。

根據以上討論的無主孤魂和「壇」的關係，再回去看 *kóo-tân*(變調為 *koo-tân*)，會發現這個詞和「孤壇(*koo-tân*，變調為 *kōo-tân*)諧音，且第一個音節平板調(level tone)，第二音節升降調(contour tone)的組成類似，更增加轉訛的可能性¹⁰³。因此 *kóo-tân* 很可能就是指祭祀無主孤魂的地方，漢字可寫作「孤壇」。我們還可以從其他史料發現被稱作「孤壇」的厲壇。新竹文士陳朝龍所作的〈竹塹竹枝詞〉中有云：

滿街香案蕪旃壇(*tân*)，報道爺來拱手看(*khàn*)；

笑煞嬌柔好兒女，荷枷爭上賑孤壇(*tân*)。

(七月十五日城隍神遶境，街上均列香案；婦女有禱祈消災解厄者，均荷紙枷到北城外厲壇燒化。)

所以綜合以上的史料和分析，我們知道 *tân* 這個詞素有「壇」和「亭」兩種寫法。古亭這個地方早年曾有地方祭祀無主孤魂的厲壇，而厲壇也可稱為孤壇(*kóo-tân*)。但由於「壇」本身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建築物，所以這個地名在早期就已經湮滅，只留下語音，僅在文獻上被寫作古亭或鼓亭，並開啓後人許多望文生義的想像。以上推論，或許可以簡稱「厲壇說」。

¹⁰¹ 如果是今天才挖到，就會變成考古遺址。

¹⁰² Douglas, *ibid*, p.473.

¹⁰³ 另一對聲調類似而可以互相轉訛的例子為土庫 (*thóo-khò*，變調為 *thoo-khò*) 和塗庫 (*thōo-khò*，變調為 *thōo-khò*)。

七、結論

過去地名研究者對地名的解釋，往往流於望文生義，或輕易相信地方流傳的記憶，忽略地名作為語言符號的性質和產生背景，導致許多似是而非的地名解釋。這樣的現象在臺北市這個外來人口眾多，地方記憶淡薄的地方尤其明顯，所以「古亭」和「大安」兩個高知名度的地名，其源流反而眾說紛紜。為解決這樣的研究困境，我們運用了跨學科的新研究法，尋找臺灣類似地名的例子，用比較法破解漢字背後所表示語音訊息，以避免研究者對漢字表記地名望文生義的慣性。當我們正確找出地名在歷史上的語音後，接下來還必須與地名產生年代的歷史、地理環境相對照，才能正確解讀地名。

本研究以新方法重新檢驗早期研究者對「古亭」、「大安」提出的地名源流說法，發現早期研究者的論點在地名讀音、地理環境、歷史事實上，皆有許多問題，以至他們提出的歷史解釋也充滿漏洞。本研究運用跨學科的新方法，對「大安」和「古亭」提出新的見解。在「大安」方面，本研究確認前人研究中「大安」的前身是「大灣」的論點，在基於前人基礎上，運用歷史上的語言資料找出十八世紀的閩南語中 *uan* 有水池的意思，導出解釋「大灣」的「水池說」。「大安」的前身「大灣」指的就是當地的大陂。這個看法也得到有古契字和地理環境的支持。我們現在無法直接從字面和語音理解「大灣」的意思，其實是語言演變，古老的用法消失的結果。至於「古亭」，本研究提出「漁網說」和「厲壇說」兩個假說。這兩個假說與傳統漢人中心主義的「鼓亭說」或充滿農村懷舊意象「穀倉說」不同。本研究比較北臺灣的類似地名後，認為「古亭」可能和新店溪的漁業有關，源自儲藏漁網的建物「罟亭」。但來自高雄古亭坑的語言學的證據也提醒我們十八世紀的閩南語會用「亭」表示「祭壇」的意思，因此「古亭」也可能源自「孤壇」，是祭祀無主孤魂的地方，後因語言文字的演變，地理環境的變遷，最後僅留下「古亭」的地名。可惜「漁網說」和「厲壇說」何者為是，現在還缺乏臨門一腳的關鍵史料可供判斷，只能留待未來有更多史料可幫助釐清。

本研究對兩個地名考證的個案，展示了跨學科的研究法在考證地名源流上的應

用，也讓古亭和大安兩地的早期歷史圖像也漸漸清晰。這兩個處的歷史因史料零散，在臺北市的歷史書寫上長期處於被忽略的地位。未來將可進一步探討臺北盆地早期史中還未深入討論的議題，如漢人移墾聚落的空間結構、水權地權相剋等等問題。而對此處地名的解讀和考證，正是解答這些問題基礎工作。

參考文獻

- 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臺北：臺灣總督府，1932)。
-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來源：<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 尹章義，〈臺北市二十方古蹟碑文之商榷：兼論臺灣古蹟史實研究之危機〉，《臺北文獻直字》82卷(1984.04)，頁1-21。
-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
- 王世慶，〈臺北安泰堂之家譜與古文書〉，《臺北文獻直字》第47/48卷，(1979)，頁1-67。
-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1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52])。
-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763])。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
- 池永欽，〈嘉義地區農家傳統穀倉：一個人文生態學的初探〉，《地理教育》18期，1992.06，頁207-212。
-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2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1764])。
- 佚名，《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叢刊第32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3)，頁313-366。
- 佚名，《臺灣民番界址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臺北：南天，2003[1760])。
- 佚名編，《增補彙音》，收錄於洪惟仁編著《漳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1993)。
- 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 服部英雄，《地名の歴史学》(東京都：角川書店，2000)。
- 林月珠，〈都市傳說社子島：環境與民俗的邂逅〉，《歷史月刊》261期(2009.10)，頁24-28。
- 林美容，〈臺灣觀音信仰的主要型態——兼論民間佛教與民間信仰的關係〉，《臺灣文獻》59卷1期(2008.03)，頁1-20。
- 林美容、蘇全正，〈臺灣的民間佛教傳統與「巖仔」的觀音信仰之社會實踐〉，《新世紀宗教研究》2卷3期(2004.03)，頁2-34。
- 林萬傳，〈古亭區耆老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82卷(1987.12)，頁1-16。
- 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及其人文生態意義〉，《空間》62期(1994.09)，頁104-107。
- 洪英聖，《畫說乾隆臺灣輿圖》(臺北：聯經，2002)。

- 洪英聖，《臺北市地名探索》(臺北：時報文化，2003)。
- 洪惟仁編著《泉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1993)。
- 洪惟仁編著《漳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1993)。
-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0)。
- 徐宗幹，〈諭各社家長〉，《治臺必告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1867])，頁365-366
-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稻鄉，2006)。
- 翁佳音、石文誠、陳佳慧，《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
- 高拱乾，《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1694])。
- 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
- 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二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3)。
- 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三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5)。
- 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四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7)。
-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來源：<http://thdl.ntu.edu.tw/>)。
- 張智欽、韋煙灶，〈新竹市南寮地區聚落變遷及變遷過程所顯現之人地關係意涵〉，《人文及管理學報》2期(2005.11)，頁1-43。
- 梁莊愛論，《六〇年代臺灣攝影圖像》(臺北：藝術家，2002)。
- 陳文達，《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2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20])。
- 陳正祥等，《臺灣省通志稿經濟志農業篇》(臺北：捷幼，1999[1954])。
- 陳國章，《臺灣地名學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2004)。
- 陳培桂，《淡水廳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15號(臺北：成文，1983[1871])。
- 陳培桂，《淡水廳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1871])。
- 湯熙勇編，《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
- 黃叔墩，《臺海使槎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ca. 1724])。
- 黃謙，《增補彙音妙悟》，收錄於洪惟仁編著《泉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出版社，1993)。
- 瑠公水利組合，〈瑠公水利組合區域圖〉(1939)，(來源：http://webgis.sinica.edu.tw/map_irrigation/Canal_D02.html)
-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臺北市志·卷一沿革志封域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7-1991)。
- 臺灣日日新報，〈鮎小屋失火〉，1907年11月22日(漢文)。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北部地區古文書專輯》，第一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200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北部地區古文書專輯》，第二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200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輯，《臺灣地名辭書：高雄縣》13卷2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臺北縣下農家經濟調查書》(臺北：日本物產會社活版部，1899)。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臺北：遠流，1996)。

劉育嘉，〈清代臺北盆地的水利開發〉，《臺灣文獻》47卷3期(1996，9)，頁193-214。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7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41])。

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薛化元、翁佳音，《萬里鄉志》(臺北：萬里鄉公所，1997)。

Barclay, Thomas, *Supplement to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Taipei City: SMC, 1990[1923])

Douglas, Carstai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Taipei City: SMC, 1990[1873])

Kopsch, Henry, "Notes on the rivers in norther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14, 1870, pp.79-83.

Schlegel, Gustav.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lay Language", *Toung Pao*, Vol. 1, No. 5, 1891, pp.391-405.